

二十一世紀評論

回歸十年看香港

走向新的現代性： 香港回歸的歷史視角



香港非常幸運，因為中國的領導人沒有堅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解決香港的回歸問題，而是把該問題與1979年後的經濟改革和回歸後香港的持續繁榮聯繫起來。

香港的回歸與中國當時的局勢緊密相關。假如香港像其他英屬殖民地一樣，在非殖民化過程中存在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可能，那麼香港的故事就會相當不同了。但是，這種可能性在1971年就被排除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且促使聯合國的殖民主義問題特別委員會把香港從殖民地的名單中勾除。在此之後，就是決定香港如何回歸和何時回歸的問題了。當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依然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轉瞬之間，五年過去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但是香港回歸的問題被擱置到了1982年。無論如何，香港的命數已定。我們需要記住的一點是，香港非常幸運，因為中國的領導人沒有堅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解決香港的回歸問題，而是把該問題與1979年後的經濟改革和回歸後香港的持續繁榮聯繫起來。此外，在1982-1984年的正式談判期間，鄧小平對台灣問題高度敏感，並設計出了「一國兩制」的原則，這個原則確保了港人治港。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根本的問題是確保移交後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人是北京可以信任的人。英國人則特別關心怎樣盡可能較長地留在香港，或者至少在香港回歸後仍保持原有的影響力；但他們也不得不關心如何在安排了這一切的同時不被指責成「出賣香港人民」。因此，英國人在最後一刻才做出了把民主引進香港的嘗試。

香港民眾的期待很不一樣。很多人選擇用腳投票。那些留下的人要麼是無處可去，要麼是接受了自己畢竟是中國人的觀念。他們畢竟會有五十年的時間

來適應內地的同胞，很多人對此感到欣慰。然而，香港人行使其政治權利的可能性也喚醒了一些人，他們決定留下來為這些權利而鬥爭，甚至到了鼓勵內地民眾和他們一起鬥爭的地步。因而，在香港回歸前的十五年裏，希望和失望交織在香港人的心中。他們目睹着英國人和美國人在人權和政治權利上向中國政府施壓，也聽到中國大陸努力保證回歸後的生活將毫無變化地繼續下去。

這篇評論文章，將從兩個角度，對回歸後十年(1997-2007)和回歸前十年(1986-1996)進行一些比較。第一個視角是從特別行政區內部來看，第二個是從中國大陸和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地區來看香港的變化。

一 從特別行政區內部來看香港的回歸

回歸後的十年對香港人民來說是動蕩的，當然回歸前的十年也是如此。但是，回歸前十年是這座城市從不確定中恢復過來的十年。這種不確定性曾經在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期間達到頂點，在擬定香港新憲法——《基本法》的細節時，陣痛不斷。很多人接受「一國兩制」的原則是不可改變的，但是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他們的生活將會發生甚麼變化。於是，各種各樣的反應都有，有的歡欣鼓舞，有的沮喪不安。雖然反應不一，但大多數人都準備盡最大努力找到適應變化的最好方式。對樂觀主義者而言，1997年前後的不同將會微不足道。而對於其他人而言，變化將是根本性的，適應這一變化將會是痛苦的。從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中，成千上萬的人選擇了用腳投票，拋棄在香港不確定的未來。但是，數百萬決定留下的人和內地數百萬等着來香港的人，顯然是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決定。

特別行政區在回歸後十年裏經歷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動蕩，一些是可以預見的，還有一些是不可預見和不受歡迎的。最戲劇化的一次動蕩是主權移交後的第二天，也就是在1997年7月2日，泰國銖突然貶值，隨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回歸前十年沒有發生過任何類似的事件。相反，在聯合聲明簽署後的幾年裏，多數經濟部門都呈現出反彈和增長的態勢。儘管有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的「黑色星期一」，以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前中國面臨的貪污腐敗和通貨膨脹等問題，但在香港，每一次嚴重的低迷過後總能迅速恢復，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繁榮甚至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

在回歸前十年，中產階級的主要憂慮來自於其他的關注。大多數人已經默默接受了英國人姍姍來遲的民主政治；但是，對很多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來說，這個承諾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新型香港的開始。他們期望對這座城市的未來能有更多的發言權。英國人促使沉靜、保守的公務員變得更加響應流行的觀點，甚至讓高級公務員去扮演半政治化的角色。在地方性的市政事務中，少數被選舉出的代表們已經開始影響決策。但是，鄧小平對「五十年不變」的堅持，常常被用來打擊香港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實施民主政治改革之前推進民主政治的希望。

在回歸前十年，中產階級的主要憂慮來自於其他的關注。大多數人已經默默接受了英國人姍姍來遲的民主政治；但是，對很多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來說，這個承諾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新型香港的開始。

北京顯然樂意把發展之責交給香港的領導人。他們認識到，香港經濟已經，並將繼續帶給中國多種好處。北京在處理香港事務上唯一的主要誤算，是向香港施壓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款加快制訂安全法案。圖為1997年7月1日零時舉行的香港主權移交儀式。



潘達文攝

前香港總督彭定康支持政治參與的最後努力遭遇了中國大陸方面的強硬回應。這反映出，在伴隨主權移交而來的趨同問題上，中英雙方存在着真正的分歧。中國不想讓香港來設定中國政治改革的進度。但是，很多香港人也不滿足於僅僅跟隨中國內地改革的步調，並且在中國大陸沒有做好前進的準備時僅僅保持靜止狀態。雙方都明白這一點。因而，雙方都在準備應對愈益活躍的香港公眾。主要的不同在於，一方強調政治權利，而另一方則把民族認同置於更為優先的位置。但是，給多數人帶來安全感的則是普通法司法體系的保留。

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理論上對香港所有的問題均有最終決定權。但只要可以確保適當的人當上特首，北京願意尊重香港的體制，通過有限的選舉程序來控制任命特首的人選，並且最終選舉董建華和曾蔭權作為可以委託之人。北京顯然樂意把發展之責交給香港的領導人。他們認識到，香港經濟已經並將繼續帶給中國多種好處。但是，他們非常期望香港人民適應祖國，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把自己看成是中國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在處理香港事務上唯一的主要誤算，是向香港施壓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款加快制訂安全法案。這個干預既不合時宜又很多餘，其結果是成功喚醒了很多香港人在一樁政治事件中採取了一致的行動。不論五十萬人在2003年7月1日上街遊行的複雜原因是甚麼，這個事件是對所有有關問題的一種覺醒。

回歸後十年中最具爭議的問題，是如何解釋《基本法》中關於實施普選的打算，以及普選實施日期的設定。這個問題將會繼續成為特區摩擦的根源。沒有人懷疑香港人民已經做好了民主的準備。可以爭辯的仍然是中國內地政治變化

的步調，改革或不改革對中國穩定的威脅，以及香港人不加批判地接受北京版國家利益的意願。從回歸前十年就已經開始的爭論在回歸後十年有所加劇，但是很清楚，這些爭論不會取得進一步的結果，除非北京覺得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就緒。在這一點上，香港的第二體制是否能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經驗尚有待檢驗。回歸十年已經展示，香港人民在傳播其觀點時所採取的有規範、負責任的方式，可以給內地同胞們帶來鼓舞。中國領導人可能會注意到，當一個政府（比如香港政府）以法治為基礎並且相對不腐敗時，民眾的參與不會帶來不穩定。內地民眾也可以期待，隨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多和教育水準的持續提高，他們也可以掌握讓當局了解其需求的技巧。

2005年3月12日董建華的辭職和兩年後其繼任者曾蔭權的當選，以一個積極的記錄結束了這個十年。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安排或多或少完整地生存下來了，儘管存在着很多世界末日論式的惡意批評者，他們竭力尋找每一個可能的原因來宣告有關的安排是失敗的。

關於第二十三條的大聲疾呼和贊成、反對兩方採取行動的後果，確定了香港的優勢仍然是法律文化，經濟活力及教育品質。在這三個要素中，最易受攻擊的是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引導着法官，靈敏地適應「兩種制度」的環境，並且同時保持了香港人的信任。梁愛詩擔任律政司司長時，政治和法律的關係在若干場合遭遇挑戰，但是民眾對香港法律文化的信任並沒有遭到破壞。法律從業者秉承成熟的專業主義，使香港的法律體系與眾不同。這種法律文化的幸存是回歸十年來最令人鼓舞的特色。其重要性尤其體現在特別行政區面臨動蕩的最初幾年，那時經濟低迷，人們找不到切實可行的經濟方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功擊退對港元的幾次攻擊，這是對香港經濟效能的眾所周知的檢驗。可是，港府在處理另外兩大主要經濟威脅時所採用的手法，儘管最後都取得成功，但令人印象不佳。這兩大威脅一是樓市的崩潰，二是禽流感。兩者在主權移交後的數月內開始威脅到香港的經濟。兩大難題都發源於香港之外；問題在於港府究竟是回應迅速、充分有效並且減少了損失，還是實際上使問題變得更糟。

確實，即使在不能解決房地產市場問題的情況下，甚麼樣的方法能夠提供更好的安慰和保護是有爭議的。把過失主要歸因於行政長官1997年有關公共住房政策的決定是不公平的。在這裏，對比一下回歸後十年和回歸前十年，是特別有益的。這一比較將顯示：在香港回歸前的幾年裏，房地產繁榮期的瘋狂投機買賣是根本性的不穩定因素。市場上的瘋長是不可持續的、注定會遭遇調整。在區域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樓價的一路走低是不可避免的。董建華想把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某些方面移植到香港，以改變很多香港人沒有房屋所有權的情形。這樣的政策將會通過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培育新一代的利益相關者，從而保證更大的社會穩定性。這一想法具有長遠的眼光，新政策的實施需要時間。但不幸的是，金融危機也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來化解，

董建華想把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某些方面移植到香港，通過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培育新一代的利益相關者，從而保證更大的社會穩定性。這一想法具有長遠的眼光。但不幸的是，變革流產了。

董建華的新政策實際上進一步令市場更低迷。香港的房地產開發商不能再等下去。於是，董建華提議的變革流產了，並且提出這一政策也成為他的一項失敗記錄。

在1997年，很大程度上起源於本地的禽流感威脅表現出另外一番景象。屠殺一百五十萬雞隻的激烈做法被認為是有效的。在2002-2003年間，當禽流感威脅再次到來時，香港政府依然如法炮製。但是，這些都被一些更戲劇化、更致命的事情所蓋過了。這就是2003年3月爆發的沙士(SARS)。與此危機相比，早先的禽流感不過是小兒科。

沙士是香港公務員體系在這十年裏面臨的最大挑戰。沙士病毒的攜帶者從廣東來到香港，然後病毒從香港呈扇形散開，在新加坡、台灣和北美導致很多人死亡。儘管本可以更早地採取更多的行動來阻止病毒的傳播，但很清楚的是，當這種前所未有的疾病被確診出來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處理的確很果斷。加上國際性機構的介入，沙士的流行被壓下去了。香港的死亡人口總共有299人，是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地方。無論民眾對香港政府在公共健康領域的表現有怎樣的懷疑，香港政府在減少沙士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方面還是做得不錯的。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回歸前十年經歷了一次大躍進，特別是在1989年以後。除了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外，兩所理工學院和兩所通識學院也升格為大學，以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求。到1997年，新的問題產生了，這就是其他層級的教育是否獲得了相稱的支持。比如，各級學校是否做好了準備，為大學輸送合格的學生？在回歸後十年的最初幾年裏，整個學校體系得到了評估，而且政府馬上採取措施確保初級教育資金的充足。同樣，關於後殖民地時期需要採用何種新課程的適時爭論和關於教學方法與技術工具的回顧，引發了對中學教育問題的更大關注。另一個不斷引起關注的問題是內地教育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在內地，教育領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至少響應了民眾對高中、學院和大學教育快速增長的需求。香港的大學已經為內地學生競爭在香港的學習機會做好了準備，而香港的學生也想在內地最好的大學學習。現在，學校至少要增加標準漢語或普通話的使用。儘管有很多壓力，教育已經成為一個「兩種制度」並行不悖的一個領域。

1982-1984年的中英談判是艱難的，但是時機很好。中國剛剛從三十年的封閉中走出來，對自身在世界的地位尚有一些未經嘗試的憧憬。至少從香港那裏，中國很想去學習如何充分利用全球的市場。

二 從中國大陸和外部世界來看香港的回歸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看香港要複雜得多，因為似乎有各種各樣的觀點，關注香港應該為中國做甚麼。自1980年代初開始，對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來說，遵循「一國兩制」、充分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則，主要是想吸引台灣回歸大陸。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議程。一是信任那些一貫支持中國、反對英國，並且對兩種制度的理想給予了必要支持，並使之可信的香港領導人。另一個議程

是把一個革新了的中國塑造成一個按照國際規則出牌的國家。在後一個議程上，中國的成功格外引人注目。中國在回歸後十年中一直遵守協議，保留了香港的現狀。

普通的中國人則看重很多其他因素，比如香港能為中國扮演的許多角色，香港為內地樹立了最易接近的現代化榜樣，香港是國內外民眾都想要去生活的理想地方等等。至少說來，香港是很多人能找到一種體面生存方式的地方，有言論和寫作的自由，甚至是獨生子女政策的避難所。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網在過去的十年裏變得更加複雜。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這樣的發展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初期準備回歸的歲月裏就開始了。想一想在那些年間由中國派來學習香港運作情況的公務員、黨領導、軍人和學者的數量，就能知道原委了。同樣，想一想那些給北京提供了有價值的幫助、確保兩方能相互理解的香港精英，其人數之多，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英國人也一直想要提供幫助，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平穩移交，並確保自身與外部世界能繼續享用在香港積極幫助下中國發展帶來的好處。1982-1984年的中英談判是艱難的，但是時機很好。中國剛剛從三十年的封閉中走出來，對自身在世界的地位尚有一些未經嘗試的憧憬。至少從香港那裏，中國很想去學習如何充分利用全球的市場。並且，英國手中仍然握有一些牌，也有足夠的時間減弱香港回歸中國的力度而不損害其自身的利益。

對於中國想要的，在主權移交前的十年裏就已經鋪好路了。中國在1997年有關鍵人物在場，能使香港繼續幫助中國的經濟改革，並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沒有人會預測到亞洲金融危機、禽流感、房地產市場的突然崩潰，以及1997-1998年間來自外部企圖迫使港元貶值的多次協同努力。在最初那兩個危急的年份，當中國伸出援手時，北京的確對香港存有憂慮，甚至有時懷疑香港轉危為安的能力。當然，那時來自香港內部憤怒的聲音給了北京如此擔心的理由。當政策和行動未能協調配合時，行政長官和香港公務員之間的關係看起來是那麼脆弱。北京方面也許已經發現，香港人很快就表現出他們的不滿，對於實驗中的混合體制的信任也正在下降；北京也不時發現，支持北京的專家和朋友似乎沒有能力恢復這種信任。

多數人承認，讓兩個如此不同的體制協調運作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而且，儘管有關方面付出各種努力來保持一個行政主導的強大政府，但是在位的團隊仍然不得不遭受檢驗。香港公務員體系中的專業人員，與依賴董建華來滿足其需要的商人之間，存在着日漸清晰的文化差異。比較起來，民主派批評家們並不能保持團結一致，對香港的行政也構成不了多大威脅。相反，香港在政治上的不成功，在於數次企圖在主要行政職位上把商人和行政管理者捏在一起。這樣的一些實驗在主權移交前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後來的變化顯示這些實驗並不奏效。考慮到香港因為行政失靈而經受的壓力，北京當局表現出令人驚奇的自制和忍耐。

讓兩個如此不同的體制協調運作是一個全新的挑戰。香港公務員體系中的專業人員，與依賴董建華來滿足其需要的商人之間，存在着日漸清晰的文化差異。香港在政治上的不成功，在於數次企圖在主要行政職位上把商人和行政管理者捏在一起。

簡而言之，儘管有很多批評家留神中國大陸的代言人和朋友們帶來的每一個可能的侵害，「兩種制度」運行之好令人驚奇。對任何有可能會損害特首威信或者任何破壞其高級同僚工作的事情，北京的官員們都小心地保持清醒。這使我們想起，北京一直考慮的是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大局。這種增長需要中國贏得國際市場經濟大玩家們的信任，特別是北美、西歐和日本。自1978年起北京就不得不如此行事，這意味着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是國家利益的一個關鍵性支柱。鄧小平的團隊明白，多數人對中國共產主義政治結構是怎樣的不信任。一個業已回歸的、作為中國一部分而運行良好的香港，將會為中國贏取信任和驅逐恐懼，做出莫大的貢獻。

香港已經超越了僅僅扮演中國通往世界之窗口的角色，而成為中國自身發展計劃中一個完整的組成部分。如果這一變化能持續下去，那麼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十年，實際上比任何人所預期的都更加積極。

最初，北京的領導人都被看作是理性的，人們都希望中國能遵守所簽訂的協議。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慘案，嚴重削弱了這一信心。毫無疑問，多數香港人變得害怕起來，害怕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分化將會使事情變得不可預知。並且，只要這個事件留下很多沒有解答的疑問和直到今天都是禁忌的話題，那總會有一些香港人感到自己無法承受信任獨裁型中國領導階層的代價。部分因為這個原因，北京的官員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讓人看起來並未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另一個問題是董建華在管理與他格格不入的公務員時所呈現的領導能力。北京曾經指望他能同擁有實權的政務司司長密切合作。北京以為，中央的支持將會有助於特首的領導，再加上香港大商人的支持，那麼特首足以擺平公務員系統內部殘留的懷疑。但是，特首與政務司司長這個組合並沒有造就一個強有力的行政團隊；這個團隊令人失望，而北京對香港權力光譜的判斷失誤又接踵而至。陳方安生的辭職並沒有緩解這個問題。北京相信如果新的政務司司長不那麼強勢，特首的領導能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支持董建華連任。在這個背景下，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來檢驗其領導能力的決定是一個莫大的錯誤。在2002年，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難道沒有預見到人們的不安和反對程度之深嗎？

誰在北京當權的確是很要緊的事情。2003年，胡錦濤成為中國領導人後，中央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結構中公務員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一次遲來的再評估。在那個時候，公務員已經慢慢遠離了原先的殖民當局，而且能更好地理解使「兩種制度」良好運作的方法。北京準備用一個受過英式訓練的公務員來代替董建華，這是行政、心理上趨同的一個標誌。十年的實驗之後，北京的官員和香港的專業人士似乎找到了協作的基礎。這是否意味着，兩方官員建立信任和共同工作的平台愈堅固，失誤的空間就會更小？要確定這一點還為時過早。

中國有意識地努力把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經濟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並且努力讓香港通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幫助中國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區發展。香港現在已經超越了僅僅扮演中國通往世界之窗口的角色，而成為中國自身發展計劃中一個完整的組成部分。這種變化並不是一夜之

間到來的。在十年的調適過程中，當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直保持其價值時，香港不再僅僅是招引台灣回歸的樣板。香港也不僅是一個與上海、天津和北京競爭的城市，當然更不應被視為一個同中國正在發生的大轉型相脫離的孤島。如果以上變化能持續下去，那麼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十年，實際上比任何人所預期的都更加積極。

香港曾經從一個昏昏欲睡的殖民地，轉變成一個在共產主義面前英勇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象徵。現在，香港似乎再次轉變成一種全新的形象：中國最具世界性和國際化的城市。但是真正改變更多的不是香港本身，而是中國。在五十年多的時間裏，香港是外界通往中國的一個門戶。沒有人，甚至是香港的中國觀察專家，在三十年前可以預見到有現在這樣的一個中國。

中國已經學會使用和信任香港的金融部門，而香港自身的變化也依賴於此部門的活力。中國經濟的起飛為全世界的投資者提供了機會，他們需要香港幫助他們抓住這些機會，而香港則以一貫的高效能回應了全球投資者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香港所扮演的另一個關鍵性角色：幫助中國的公司在香港發行新股，並促使這些公司自信地進入國際市場。只有香港的聲譽和經驗，才能克服多數人對中國銀行系統和可疑金融記錄的嚴重懷疑。

通過其堅決的經濟改革政策實現和平崛起之後，中國作為未來世界一極的形象，將會對整個世界帶來極為可觀的影響。在這一形象之側，香港看起來怎樣呢？一方面，趨同的圖景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香港僅僅成為中國的另一個省級城市，而這將對香港的地方自由造成威脅並拖延其民主潛力。另一方面，香港仍然是中國改革目標的燈塔。通過香港，中國掌握了市場現代性的基礎；通過香港，很多中國城市走向了繁榮。除了金融服務這種只有香港才能可靠提供的產品之外，其富有活力和動感的經濟，現在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了。中國市場這塊蛋糕已經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即使香港分享的份額變小了，仍然足以使之成為中國最繁榮、進步和具有世界性的城市。

作為通往台灣的一座橋樑，香港仍然是有用的。儘管在1990年代或許有些不情不願，但是香港正在形成一種泛中華認同，從而令中國確證香港人的愛國主義。一如既往的是，香港繼續博得多數海外華人的尊敬和信心，特別是那些在東南亞的華人。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同中國南方的地方和省級官員們保持密切關係，對那些尋求在中國南部投資的人來說，香港已經變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不過，親近中國也是有代價的。例如，香港對環境污染並無防備，現在這些污染折磨着毗鄰的中國內地地區，而外界對香港環境的印象也已日益負面化。

還有一個大問號。面對着在中國主要城市裏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香港將怎樣經營？受過更好教育的大陸人爭取成功的欲望超越了香港人。他們對高科技技能和外來知識的愛好程度，已經向曾經因競爭力而享有聲譽的香港人提出了挑戰。無論如何，香港仍然有很多優勢。除了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最高水平

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十年表明，原本期待的趨同並不會基於中國內地變得更像香港或者香港順從內地的路線。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香港會造就一種獨特的、新的中國現代性，而內地和香港都對這種現代性有所貢獻。到時候，在「兩種制度」下生活的人們，最終會對趨同達成共識。

外，香港在教育的競賽場上仍然佔有優勢。香港將會關注通過更充裕的研究基金和更高的學術標準來保持教育堡壘領先的能力，至少是保持吸引中外最好的學者到香港任教的能力。

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幾年沒有像很多人恐懼的那樣——香港從此變得衰弱。一些人也許會聲稱這是國際監督的結果。中國改善其現代化形象的渴望，間接支持了這種說法。雖然這一背景並非無關緊要，但是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回歸一個非常不同的祖國存在着不確定性，而成功戰勝這種不確定性的主要貢獻因素還是來自香港的人民，也來自富有遠見、但又講究實用主義的北京領導人，而正是他們始終把香港放在一個更大的國家和民族發展的議程之上。不管有多少缺點，《基本法》在秉承現實主義的行政管理者和專家手中，已經轉化為一個可使用的憲法。儘管其主要訴求並沒有成功地獲得回應，但是，追求民主保證的香港人民已經確保了法律體系的完整，確保了反對和批評的渠道暢通無阻。儘管不時有「愛國主義」的抱怨之聲，但是對香港非常自由的媒體的約束已經減弱了。借助中國在香港經濟困難時提供的援助，商業從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中生還過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人已經適應了新的現實，並且做好準備，到內地去冒險，去學習，去工作。他們的父母曾經感到與內地同胞的巨大差異，現在已經愈來愈小了。內地和香港年輕的專業人員在愈來愈多的領域競爭與合作。

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十年表明，原本期待的趨同並不會基於中國內地變得更像香港或者香港順從內地的路線。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香港會造就一種獨特的、新的中國現代性，而內地和香港都對這種現代性有所貢獻。在這裏，令人鼓舞而着迷的里程碑就是英國遺產減少的速度。除了體現在法律體系和某些官僚政治的程序中，與很多人的預期相反，香港人更少記起英國的方式。甚至於，即使關鍵的理想和價值也許能在英式教育中找到根源，但人們很少會意識到這個背景。相反，英國人在殖民地傳播的價值已經同國際標準融合在一起，這些國際標準不僅盛行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地方，而且也在中國大陸年輕一代之中扎下了根。那些價值已經被內化了，並且現在被認定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或許，這一國際性內化的結果，會令那些深切關注香港世世代代發展的英國人感到欣慰。這樣的事情發生得愈多，香港的現代性融入新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愈容易；到時候，在「兩種制度」下生活的人們，最終會對所有前文提到的趨同達成共識。如果說過去的十年是嚮導，當最終兩地的趨同水到渠成之時，誰提供了甚麼，誰提供了更多，那又有何要緊呢？

劉晨楠 譯、顧昕 校

王廣武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